

訪旅法比前輩傅維新先生

鄭光伶

在飄著細雨的冬日早晨，藍健民主編偕同卓鳴鳳先生與本刊編輯部，赴林口長庚養生村訪問傅維新伉儷。經過了雨中壅塞的車潮，我們自熙攘的市區轉入了寧靜的養生村園區，甫一下車，便見到傅維新先生及夫人已在大廳等待我們的到訪。在大夥相互寒暄以及簡單地介紹了周遭環境後，我們來到了傅先生位於養生村內雅致的小公寓內，開始閒話家常。

傅維新先生生長在北京一個眾人眼中和樂的家庭，但卻正逢一個兵荒馬亂的戰爭時期，七七事變發生當時，剛上高中、熱血方剛的哥哥跑去參加抗日活動，再也沒有回來，從此使這個和樂的家庭蒙上一層陰影。童年時期目睹日本軍隊帶著馬車隊從北京的德勝門大步跨進，家園成了八年抗戰時期的淪陷區，在他幼小的心裡烙下深刻的印象。家庭則因為兄長抗日發生了變故，替日本人工作的中國便衣亦不時上門，令家人擔心受怕，於是一年連搬了好幾次家，國家在動盪之下，生活真是如履薄冰。

日本投降之後北京光復，傅維新先生的心裡雖高興，但此時共產黨已大量吸收了年輕人與知識份子，活動頻頻。歷經了使人心不寧的抗戰與反共的亂世，這時身在北京的傅維新先生已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看著共產黨揹著昔日國軍的裝備四處遊走，又見到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紛紛加入共產黨，心中實在五味雜陳。終於，在經歷了沈崇案後，傅維新先生知道北京不能待了，在1948

年底決定與相識多年的張炳煜女士結婚，夫妻兩人一起離開大陸，輾轉來台。

移居台灣的傅維新先生進入了教育部工作，起先是在國際文教處負責留學生出國與公費留考的業務，在外派出國之前，亦處理文化方面的事務，其中與歷史博物館的合作關係最密切，當年台灣在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與鄰近的韓國、日本、越南等亞洲國家較為頻繁，一切都處於起步的階段。

後來，傅維新先生奉派前往巴黎工作，豈料第二年卻面臨了中法斷交的窘境。原本為逃離共產黨而來到台灣安定生根，沒想到輾轉到了巴黎卻還是活在共產黨的擠壓之下，實在令人感慨。台灣與法國斷交之時，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成員的我國，於是便以這個組織的名義，在法國繼續進行外交工作，沒多久，傅維新先生再度由教育部調至比利時。而隨著退出聯合國，台灣也與比利時斷交，所幸當時比利時比較專注於本國事務，對外國事務較不熱衷，所以我們與比利時尚可繼續維持非正式的外交關係。與法國斷交轉往比利時後，傅維新先生曾幾度回到法國料理事務，但因為斷交後身份的問題被法國列入黑名單中，無法得到入境簽證，只好改以UNESCO顧問的名義，赴法國參加會議，外交的困境帶給駐外人員許多禁錮，但是大家總是努力地想辦法突破。

而當時無法自由地前往法國的傅維新先生，只好開始將目標轉向北歐、南歐或是法國北部的地區進行學術合作、獎學金的洽談工作。

回想到當年離開巴黎到了比利時，傅維新先生表示，由於外交情勢岌岌可危，當時打開行李箱並沒想到會在新的地方久留，而當台灣與比國斷交後，他以為得像之前在巴黎那樣，必須再度收拾行囊離去，沒想到，政府改設「中山文化中心」代表機構，讓駐外人員們背負著更艱鉅的任務留了下來。

問起傅維新先生，為何在比國待上這麼多年？他直說當年可真是完全不知道情勢會如何發展！當年駐外單位的經費相當拮据，要支付房租以及僱員的薪水，可以說是捉襟見肘。當年外派的日子並不快活，由於沒有邦交，常常做什麼事都碰壁，當時接待一些到比國訪問的大學校長或是學術界人士，大家餐桌上談到加拿大、義大利或是某某國家又陸陸續續承認了共產黨，眾人聽了心頭都是一陣心酸。

在比利時工作時期，由於從事文教的關係，傅維新先生先後去了北歐、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各地協助籌備展覽、在各地學校舉行文化活動，這些辛勤的付出與努力，在多年之後漸漸開花結果。以往邀請諾貝爾學者需要耗費大筆的預算，包括交通、食宿以及演講費用，所費不貲，但是上天眷顧帶來好運，傅維新先生幾次順利邀請到願意進行免費演講的諾貝爾學者，甚至自費帶了助理！

在台灣與比國斷交時期，由於沒有邦交的關係，我們與比國之間並沒有交換獎學金的計畫，後來傅維新先生與同仁積極在比國與許多大學直接接洽，慢慢建立了交換獎學金的合作方案。

駐外時期這段艱辛的時光持續到傅維新先生退休前的十來年，之後遇上台灣經濟起飛，外交

情況慢慢有了改善，一切才漸入佳境，可以說是遲來的春天。

1990年，傅維新先生自奮鬥三十多年的職場退休，由於與一位任教於奧地利的波蘭籍美術史教授結識的因緣，兩人共同策劃了收藏家Johnson先生到台灣的展覽，在漫長的交涉過程中，傅維新先生在波蘭結識了曾派駐比國的外交官，透過他的引介，進一步與比國文教、外交界的人士進行了許多文化交流的事務，邀請他們到台灣訪問。傅維新先生亦將在東歐結識的舞團引介到台灣表演，推廣東歐的民俗舞蹈以及傳統音樂，這段期間，他跑了捷克、白俄羅斯、匈牙利等國，過程曲折，但他慶幸自己遇到許多古道熱腸的人士，幫助他順利完成任務。

談起文化對傅維新先生的意義，他認為這一代的人做事應該有別於過往，我們應該更積極地發現可能性並努力開拓文化交流的機會。比方說，當年他發現我們在比國雖有大使館，卻沒有許多交換獎學金的計畫，便想起清朝光緒年間留比國學鐵路工程的學生很多，這方面的交流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於是興起他推展這個業務的使命。斷交後更積極直接與大學校長商談，以文化為出發點，爭取到許多機會，以至於後來談定的獎學金交流案甚至比從前有邦交時更多，這是很不容易的成果！

而面對比利時這個人稱工程師小國，他認為與荷語區的人打交道比較容易、較務實，事情比較可以順利推展進行下去，這也是他的觀察與訣竅之一。在比利時期間，傅維新先生引進很多歐洲的展覽到台灣，他發現，比國的地鐵裡到處都有藝術品，在尚未斷交前，他曾參觀比國正在修整的地鐵，這是個實務上有許多困難的艱鉅工程，但是當時有遠見的比國人便已把公共藝術規劃到工程當中。所以，要想了解比國的現代藝術，當然要

到地鐵瞧一瞧了！這裡包含有抽象、寫實、超現實等各派別的藝術作品，也是拜此之賜，後來傅先生在時任文建會主委郭為藩先生的提議下，出版了「布魯塞爾地鐵之藝術景觀」這本書！

退休後，傅維新先生繼續投入華僑中山學校的工作當中。中山學校的由來是因成立那年剛巧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百年誕辰而得名。傅先生先後擔任學校的董事及榮譽董事。成立之初，華僑學校靠著董事及旅歐華僑的捐助幫忙得以營運，對當時的他們來說，要是可以借到地方進行授課，那麼傅太太可以負責教書，一切便好進行。於是，一開始是在餐館開始上課，每天下午三點鐘休息後，便在那兒上課到五點，五點之後因為餐館要開門營業，便得快快結束。久而久之，大家認為這非長久之計。後來，找到一棟房子作為辦公及上課場所，學校有了固定的地點。

當年的華僑幾乎都是開餐館或是從事手工藝工作，境況大多不寬裕，傅維新先生便與教育部商談給予自魯汶來教書的老師一點通車費用的津貼，以及籌措其他老師的交通費用，紓解僑胞的經濟壓力。現在，中山學校教授正楷字，也隨著潮流教漢語拼音以及注音兩個系統，有些來自大陸的醫生、學人也送他們的孩子來這裡學習正體字。目前中山學校也開始嘗試向比國的學校借教室，因為比國星期六不上課，中山學校現也招收學習中文的外國學生，在新的時代裡展開她新的任務。

傅維新先生回想會在比利時待這麼長的時間，一開始不是自己的選擇，當時比起外派美國，派駐歐洲的待遇相當微薄，此外，美國由於華人多，生活也容易些，在歐洲一開始連買醬油都得搭火車去越南商店買，也只能買到日本醬油，但是日子也就這麼在充實與踏實的工作中，以使人不察覺的速度一點一滴地流過了。

現在的傅維新先生仍充實地過著每一天的生活，他有許多的寫作計畫，其中一個念頭便是想寫1949年發生的故事，畢竟有同他這樣時代經歷的人不多，雖然已經有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與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兩本書問世，但是究竟個人經歷不同，要傳承分享的角度也不一樣。

在過去面臨斷交危機的不安寧環境，內心揣揣著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離開腳下的土地，異鄉環境的動蕩，比起身在台灣的人們看待斷交事件衝擊力道不可同日而語。尤其身在國外面對街上的洋人，心理上總覺得外國人看待我們的眼光好似在對我們發出疑問：「你怎麼還在這兒沒有走？」走過這段動蕩的時光，現下不論是外交或是文化交流上的推展，都比過去來得順遂多了，傅先生總是笑稱這是遲來的春天，而也只有走過從前的筆路檻樓，才能這麼珍惜現下的累累的果實吧！

訪談結束後，傅先生佻儷親切地招待我們一行人共享午餐，養生村中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無不露出親切的笑容，耐心地對待村民以及訪客。傅太太告訴我，最近養生村內要舉行一項投票，選出最有愛心的親善工作人員，我問傅太太準備投給哪位工作人員，沒想到傅太太一口回絕說：「不，我們不會去投票。」原來是因為傅先生與傅太太認為村內所有工作人員的表現都相當好，同樣地友愛，若硬是要選出最有愛心的人，對其他工作人員並不公平。我很訝異於傅先生與傅太太對於這些付出愛心的人們也同樣報以公正不偏頗的尊敬，我想，也就是因為抱持著這份心意，才能在過去許多困境中，為我們找出一條有尊嚴的道路前進，才能造就今日的果實。

餐後，我們互道珍重，透過車窗望著在寒冷的雨中目送我們離去的傅維新佻儷，在這個帶給我們許多啟發的訪談中，深深溫暖了我們一行人。